

[编者的话: 本刊从2016年第4期开始不定期地设立“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究”栏目, 刊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语言、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前沿学术论文。2017年3月25日, 《当代语言学》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2017当代语言学前沿: 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期建设内容的一部分。田海龙与赵芃的这篇题为“批评话语分析再思考——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与社会关系研究”的论文就是以这次研讨会上宣读的报告为基础修改而成的。本刊以后还将不定期举办以“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为主题的当代语言学前沿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上宣读的优秀论文经评审、修改后将在本刊专设的“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究”栏目刊出。欢迎有关学者关注以上前沿会议并给会议以及本专栏投稿。]

## 批评话语分析再思考<sup>\*</sup>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与社会关系研究

田海龙 赵 芃

**提要**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可以发现二者的观点侧重不尽相同。然而,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法兰克福学派寻根, 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问祖, 将马克思也说成是批评话语分析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些论点进行思考, 我们认为, 如果说批评话语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所联系, 那便是辩证唯物主义为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 我们提出批评话语分析回归马克思,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意识第二, 以及认识的基础是实践的观点, 认为这样可以使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建构作用的强调不走入极端, 不脱离社会实在对于话语建构的基础和决定作用这一根基, 同时可以使批评话语分析在实现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和机遇。

**关键词** 语言与社会 批评话语分析 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交流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4BYY0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的核心内容曾在“2017当代语言学前沿: 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 2017年3月25日)上宣读, 谨对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表示感谢。

#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Based Study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TIAN Hailong and ZHAO Peng

**Abstract**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Marxist philosophy holds that language comes into being out of its need, the necessary need for communication. This social view of language differs from tha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in that CDA, preferring the term of discourse to language, lays an emphasis on the shaping function of discours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dmitting that discourse is shaped by society. In this regards, CDA finds its theoretical origin in Frankfurt School (Fairclough and Wodak 1997). The problem arises, however, that CDA does not stop in relating itself with this Western Marxist school but goes one step further and attributes its origin to Marx himself, Marx a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 (Fairclough and Graham 2010).

The argument that Marx i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 comes from CDA scholars' examination of Marx criticizing capitalism and of the method Marx used. They believe that CDA's criticism of New Capitalism is attributable to Marx and CDA's linguistic analysis to Marx's method of critique of language. Their examination holds water to some extent, but is the "water" adequate enough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Marx i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 The answer might be negative, given that CDA has taken as its theoretical origin the Western Marxist Frankfurt School, which is generally agreed different from Marxism both in time and in thoughts.

Then, why CDA scholars relate their practice to Marx? A second thought given to this question leads to another: are there any relations of CDA with Marx?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need to scrutinize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o stand in Marx's shoes in understanding that material reality goes before consciousness and that the foundation of consciousness is practice. With this light shed on CDA'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it can be found that CDA's emphasis on the shaping function of discourse attempts to go to an extreme as is argued in CDA that the social is not around discourse, nor correlated with discourse, but rather in the discourse (Kress 2001). A remedy to turn this tendency is obviously to go back to Marx and to take social real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t is in here, it might be safe to say, that CDA can find a link with Marx, which is neither simple nor direct as is argued in the assertion that Marx i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 but a relation in which CDA draws on Marx.

Going back to Marx is good for CDA not only that it provides CDA with a link to Marx, but also that CDA can find source fo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Drawing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aking the social real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CDA practitioners might find the social status quo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new and different from those the first CDA generation faced in 1980s and 1990s, and then are likely to take these new social realities as challenges that may trigger new thinking and opportunities that may foster new theories. To help CDA scholars and students realize this point is one of the points made in this rethinking of CDA in terms of its relation with Marx.

**Keywords** language and societ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arxism

## 1. 引言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语言学所关注的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

的问题。在语言学领域,变异社会语言学家曾通过观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语音(Labov 1997)或不同地域的人的语音(Trudgill 1974)来研究不同的发音与言说者社会身份地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互动社会语言学,以及在欧洲兴起的批评话语分析,则更为关注社会活动者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主动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例如,社会语言学家伽尔(Gal 1998)通过分析奥地利农村年轻妇女拒绝使用匈牙利语而更多选择使用德语进行日常交流的情况,指出这种语言选择实际上表明了这些年轻妇女拒绝其农民身份的思想意识;她们试图通过选择使用德语使其在工业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实现社会身份由农民向工人的转变。批评话语分析家沃达克(Wodak, et al. 2009)也曾观察政治家如何通过语言的使用来建构国家身份。

与语言学家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更多地涉及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确定语言的本质,关键要回答“语言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问题(Holborow 1999:16)。对此,马克思一方面坚定地认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卫志强 2015:3),另一方面,马克思从语言与思维及意识的关系上对此进行论述,指出“人们的想像、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也是这样”(卫志强 2015:19),并强调,“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卫志强 2015:20)。这里,通过对语言本质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现在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面,正如霍尔博罗(Holborow 1999:16)引用马克思、恩格斯下面这段话所要说明的那样:最初“精神”是依附在“负载”的事物上面,这些事物使精神以语言的形式出现。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与语言学家对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阐述有所侧重,但是,这些研究在推动人类思想发展方面起到异曲同工的作用,并启发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思考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以及语言学家(特别是批评话语分析家)的观点可能会因彼此有所侧重或不同而发生碰撞,进而形成新的思考课题,促使对形成这些区别的内在动因进行分析。这样的思考将导致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再思考<sup>①</sup>,进而形成一些新的思考结果。将这一思考的过程呈现出来,并将由此产生的思考结果陈述于此,一是求教于各方,同时也是求得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 2. 相关概念与研究问题

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有必要首先厘清各种各

---

<sup>①</sup> 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思考及再思考已有很多,涉及到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Billig 2008)等等。本文的再思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集中在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方面。

样的马克思主义，定义其内涵。而且，由于批评话语分析声称源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Fairclough and Wodak 1997)，也有必要界定马克思主义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内在联系。这不仅为后续的讨论在概念上提供一个基础，而且会发现可以进一步探究的研究问题。

首先，要认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是西方的学术文献所指的真正的或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其次，还要认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在“忠实于”马克思原著的幌子下遮蔽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呆滞的学术研究(萧俊明 2001)。还有一个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称“新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特点是试图“重新发现”马克思和“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或改造，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往往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也称为“后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学派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的社会政治观点集中反映在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的著作中。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如纪咏梅(2008)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与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但是，也有学者(贺翠香 2012)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从其他思想传统中拿来许多东西补充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因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为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特征。在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 20 世纪 30-40 年代，新资本主义体现出与早期市场资本主义不同的许多特点。在新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最大的支出者和社会保险的提供者直接干预经济，使赤贫者有条件去不断地消费，进而远离激进的政治运动。同时，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清楚的文本，而是一种日常经验，它通过诸如通俗文化和社会科学等不同的话语使个人充满了一种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感觉。一言以蔽之，在新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所充斥的话语把世界描绘成理性的和必然的，那些早期市场资本主义时代文本式的意识形态已经转变为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即物化(reification)、统治(domination)和霸权(hegemony)。面对新的资本主义形态，法兰克福学派从其他思想传统中拿来许多东西补充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被认为继承并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

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集中体现在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面。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存在某些差异，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重点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则集中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但是，这种批判重点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政治理论，而是说明法兰克福学派要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往往被遮蔽(mystify)起来，因此很难拒斥。所以，对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就要对建立在人们日常经验和活动中的物化、霸权和统治进行揭示，使之去神秘化(demystify)。

正是在将意识形态去神秘化上面，批评话语分析的倡导者(Fairclough and Wodak 1997)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践者还借助自己掌握的语言学分析方法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念应用到对新资本主义文本的去神秘化分析之中。例如，费尔克劳通过对英国工党政府1998年3月发布的一份福利改革的绿皮书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将工党政府罩在福利改革计划上的光环一层层地拨开，揭露出其许多矛盾的行为，如一方面信誓旦旦要“权力下放”，建立一个“现代”和“合作”的政府，另一方面又要追求政府的高度控制(Fairclough 2012:221)。在这个去神秘化的过程中，费尔克劳发现的这些矛盾是基于他对这个绿皮书的文本分析。例如，他发现绿皮书中论述福利改革的话语是一个对话和咨询的过程，但体现实施改革的语体却带有推销和非对话的性质(Fairclough 2012:222)。他还发现，在绿皮书中“工作”的不同含义(如“岗位、劳动”)被混淆，最终导致一个声音，即“福利”等于“工作”，而“工作”的传统含义(岗位)在绿皮书中悄无声息地消失殆尽(Fairclough 2012:223)。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将其对新资本主义的批判归功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迪，而且还进一步将其主张追溯到在时间上早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批评话语分析者。例如，费尔克劳和格兰汉姆(Fairclough and Graham 2010)从“抽象教条”、亚里士多德的辩证观以及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意识形态概念三个方面解读马克思批评方法中的话语层面问题，断言马克思也是批评话语分析者。他们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唯一的最具有实质意义、最具影响的批判，而且马克思的方法对分析正在现形的新资本主义仍然重要。同时，他们也指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方法中包含许多语言批评(critique of language)，其重要地位并未被充分认识到。这里，费尔克劳和格兰汉姆的观点十分清楚，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包括了现在被称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因素”(Fairclough and Graham 2010:303)，因为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问题的探究也要借助对话语(语言/文本)的语言学分析

(田海龙 2016a)。

费尔克劳和格兰汉姆(Fairclough and Graham 2010)认为“马克思是批评话语分析者”(Marx a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像批评话语分析对新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那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像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注重文本的语言学分析那样,马克思的批评方法中也有对文本的语言批评。然而,如果像他们断言的那样马克思是批评话语分析者,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岂不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我们有理由确信,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如果是这样,费尔克劳和格兰汉姆的断言能够站住脚吗?换言之,批评话语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什么联系吗?这是一个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重新审视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

### 3. 批评话语分析之语言与社会关系

引言部分简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语言与社会的论述,这里讨论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与社会的认识。“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是一种辩证关系,其最经典的表述是费尔克劳和沃达克的名句:“话语不仅反映社会,而且建构社会”(Fairclough and Wodak 1997:258)。然而,虽然批评话语分析承认话语是社会的反映,但是,它更关注的是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在这方面它与美国的互动社会语言学以及新修辞学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田海龙 2013, 2015)。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既可体现在对情景和知识的建构方面,也可体现在对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人的身份以及人们之间关系的建构方面(赵芃、田海龙 2013; 赵芃 2016)。批评话语分析强调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就是在其研究中凸显话语帮助维持和再生产社会现实的作用,以及话语促进社会现实发生改变的作用(Fairclough and Wodak 1997)。

不可否认,批评话语分析在承认语言反映社会的同时强调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批评话语分析在语言学领域的前沿性。例如,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对语言运用反映社会身份的研究而言,批评话语分析超越变异社会语言学对语言与社会对应关系的认识,更多地关注语言对语言使用者社会身份的建构。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并持续产生影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不是将语境视为语域变体,并以此作为参照物用与传统语法不同的方式重新描述语言结构,而是透过这种描述所提供的语言结构(如动词的及物性结构、语气结构以及主位结构)来窥探语言结构中体现的那些影响语言运用的社会因素。特别是,批评话语分析与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不是语言的本体,

而是包括语言运用在内的所有和语言运用相关的因素。所有这些区别性特征实际上表明,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对话语建构社会的强调,体现出批评话语分析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话语分析与体现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法兰克福学派一脉相承。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发现在新资本主义时代统治阶级借用通俗文化的话语使被统治者在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感觉中认可这种统治,那么批评话语分析则是把话语的这种统治作用以论述“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的方式精辟地阐述出来。在批评话语分析者看来,话语就是社会现实的“替代品”(Fairclough 2006),或者说,“社会就存在于话语之中”(Kress 2001)。批评话语分析如此对语言的社会解读,虽然相对于将语言视为一个封闭系统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 and 将语言视为一个纯生物产物的乔姆斯基生物语言学是一个进步,但是将话语与社会等同起来,甚至将话语视作社会现实存在的基础,认为社会现实是话语建构的结果,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担忧。

这种担忧至少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如果认为话语可以建构社会事实,那么改变话语以及解释话语势必会成为启动社会变革的前提和方式。这里,学者的担忧在于,这种对话语形式变化的过分强调,在一些情况下将会导致政治内容为话语形式所决定。试想,如果社会现实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那么,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改变则只需要改变话语就可完成,而一切社会活动都将成为从属于话语的、次要的活动。在这样一个“形式决定一切的世界里”,霍尔博罗(Holborow 1999:195)担忧“产生社会变化的动力将无从而生”,甚至感叹,在这样的世界里,“人怎么可能脱离话语?他又怎能超越话语?”

学者的另一个担忧在于,批评话语分析过于强调话语建构作用将导致社会事实被规避,并被置于不重要或不显现的位置。费尔克劳(Fairclough 2006)对新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曾明确表明,话语建构的全球化与实际发生的全球化是两种不同的全球化,而批评话语分析则要在对此区分的基础上,探索话语如何构建出一种存在于话语中的全球化以及建构全球化所需的话语策略(田海龙 2010)。批评话语分析如此在研究中对社会实在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一种偏见,即社会实在在这种对现实形成认识的过程中不再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而是一种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作用。对现实的认识和表述不是因为现实的存在而产生,而是因为对现实表述的不同而形成对这个现实的不同认识。如此对话语建构作用的强调,在脱离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同时,也给人留下“似乎语言有和战争、瘟疫和疾病一样巨大的物质力量”(Holborow 1999:14)的印象。

#### 4. 回归马克思:批评话语分析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建构作用的“过分强调”(Holborow 1999:195),违背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创造历史的论述。正如霍尔博罗 (Holborow 1999:195) 指出的那样, 这样的理论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 即改变环境的是人。有鉴于此, 霍尔博罗 (Holborow 1999:190) 指出, 对于那些宣称一切皆存在于文本之中、文本之外皆空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 回归现实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讨论至此, 我们可以就上文列出的研究问题给出一些初步答案。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费尔克劳关于“马克思是一个批评话语分析者”的论断是否十分的正确。尽管费尔克劳提出的支撑其观点的两个论据无懈可击(见上文), 但是, 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建构作用的“过分强调”还是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格格不入。诚然, 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也不否认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在这一点上, 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内容可以对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建构社会”的论述有所支撑。然而,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世界观是唯物的, 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即物质是第一性的, 意识是第二性的。认识的基础是实践,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实践也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因而, 有理由认为批评话语分析过分强调话语建构社会的作用偏离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这也在一个方面表明批评话语分析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在语言学领域的翻版, 而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完全体现。

那么, 批评话语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什么联系吗? 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 对此, 答案可以是肯定的。但是, 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关联, 亦不是费尔克劳的一句“马克思是批评话语分析者”所能穷尽的。相反, 批评话语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是批评话语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关于“回归”, 王寅(2014:503)解释为是“指对传统理论的再理解, 并从传统理论中获得新的启示。”然而,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 胡建华认为, 这里所说的“再理解”有两种情况: 一是指在前对马克思已经理解的基础上再进行理解; 二是指先前并没有理解, 或者仅是一知半解, 然后再下大力气继续去理解, 以争取把它理解了。如果是前者, 那么“再理解”是对马克思本意的理解, 还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做的理解? 如果是后者, 那首先要做的就是去理解, 而无“再理解”之说<sup>②</sup>。

如此推理, 凸显出我们提出批评话语分析“回归马克思”的本义: 这里的“回归马克思”, 不是要求批评话语分析者“对马克思再理解”, 也不是与“回到

---

<sup>②</sup>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胡建华研究员与本文第一作者电子邮件交流。



马克思”的说法咬文嚼字，卷入文字争论之中<sup>③</sup>。胡建华认为，回归马克思就是切实理解马克思，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握马克思的基本精神，理解他当时为什么这样或那样说，他当时面临和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同时，要把自己并入到马克思的思维中去，设法去理解马克思的思路是什么，让自己站在马克思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设想一旦出现了马克思那个时代没有出现的新问题，马克思会如何来思考<sup>④</sup>。总而言之，回归马克思就是要设法让自己进入到马克思的灵魂中去，像他那样去思考，去解决新问题。这样的回归，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坚持，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解决马克思那个时代不曾遇到的新问题的各种社会实践。这些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因其具有解决新问题的性质，往往体现为一种对以往实践活动的“超越”。

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便是这样一种“超越”，而且随着认识的深入，批评话语分析也会被“批评话语研究”所超越(田海龙 2016b)。换言之，批评话语分析回归马克思，就是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回应发展的新挑战，实现自身理论的新发展。

回归马克思，首要的问题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不否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因而批评话语分析强调话语对社会事实的建构作用也不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相悖。但是，在讨论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时候，首要和基本的观点是社会生活和劳动决定了语言的产生，社会实在也是人们(包括研究者)对社会现实形成认识和进行表述的基础。不论对同一社会实在的认识和再现有几个版本，都不能否认社会实在只有一个。因而，批评话语分析在重新审视语言与社会关系时回归马克思，就是要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问题，进而使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建构作用的强调不要走入极端，不要脱离根基，不要否定社会实在对话语建构的基础和决定作用。

如此回归马克思，批评话语分析可以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田海龙(2016b)介绍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学者(如Krzyżanowski 2016)提出超越批评话语分析的观点，并预测《话语与社会》2016年刊发的“批评话语研究”专辑将会像这个期刊1991年刊发的“批评话语分析”专辑将语言学范式的话语研究从“批评语言学”推向“批评话语分析”那样，将“批评话语分析”推向“批评话语研究”的新阶段。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一发展趋势，可以被认为是迎接新的理论挑战的必

---

③ 《回到马克思》(张一兵 1999)出版后，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论，例如，何丽野(2005)对“回到马克思”提出“文本”质疑，王金福(2012)虽然在阐释学的意义上赞成“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但是对“回到”(也就是把握、揭示、复原、复现)马克思是否可能还是提出疑问(王金福 2013)。

④ 引自胡建华研究员与本文第一作者电子邮件交流。

然,但是,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不能不是推动批评话语分析发展的新动力。

那么,批评话语分析在 21 世纪面临什么样新的社会现实?这些新的社会问题与批评话语分析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处的历史时代有什么不同?克里斯蒂娃(Kristeva 2016:1)对此的回答值得一读:“一面是科学技术史无前例的成就,一面是破坏力在世界范围爆发,……超级网络自诩可在点击之间链接全球人类;数字技术重新激荡起原始的宇宙之力,并可将身体器官三维成像于电脑屏幕上;而在人类被克隆实现之前,日臻完善的机器的人化已然预告一个超人类时代的临近。……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反对者、一些脆弱的青少年以及绝望中的狂热分子,将自己变成人肉炸弹,在巴黎、戈麦隆与曼谷播种死亡。此外还有全球气温与二氧化碳含量的不断攀升……。”她(Kristeva 2016:2)进一步指出,“21 世纪,在科技创新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压力下,社会契约的传统调节手段一一失灵,无从翻新。……而经济与政治的敲敲打打既不稳固也不实在,远不足以亡羊补牢。”

不可否认,客观现实世界的新特征引发了许多话语方面的变化(*discursive change*),并形成当代公共话语的一些新特征,如:“后英雄”社会的兴起及对过去历史具有区别性的建构、公共及其他领域话语愈加断裂和碎片化以及话语因技术的作用和影响在社会中广为渗透等等(Krzyżanowski and Forchtner 2016:256)。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话语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个时代的话语特征,是由发生在这个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所引起。因而,任何对这些话语特征的研究,都需要重视引起这些话语变化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批评话语分析超越自身,实现新的发展,就需要回归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为理论构建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这一点,一些学者已经给予关注。克瑞兹诺斯基和福特纳(Krzyżanowski and Forchtner 2016)提出对“原始的、传统的、基础的、核心的、以语言运用为导向的”的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超越,其出发点便是他们注意到,批评话语分析正在面临被称为后危机时代或“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来自现实世界及社会和学术界的许多挑战,尤其是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与批评话语分析在其形成初期(20 世纪 80-90 年代)所关注的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他们提出“批评话语研究”这一术语,以期体现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超越,同时强调这种超越不仅需要在学术世界被重新审视,而且需要从现实世界被重新审视。

## 5. 结语

将自身的研究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费尔克劳并非是第一个。美国结构主义

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曾对哈里斯 (Zellig Harris) 说, 他在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非常深刻地感到马克思对社会行为的处理与语言学家的处理方式惊人的相似 (Matejka and Titunik 1973:1)。语言学家频繁地将语言学的研究与马克思联系起来, 视马克思为学界鼻祖, 并非一定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到自身研究的踪影,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推崇。

但是,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不应该成为各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机械连接, 更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各自学派的护身符。相反, 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需要体现为回归马克思的勇气和下大力气去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精神, 进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不断获得启迪,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不断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就批评话语分析而言, 这一点非常重要。考察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我们发现, 批评话语分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有着相同的认识, 都对属于上层建筑的话语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研究。然而, 这并不等于批评话语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就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一样。费尔克劳关于“马克思是批评话语分析者”的论述, 以及苗兴伟、穆军芳 (2016) 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都将批评话语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联系了起来。但是, 如果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 可以发现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在本质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同的。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建构作用的过分强调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 而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对批评话语分析这些观点再思考, 凸显出回归马克思对于批评话语分析进一步理论发展的必要。

#### References [引用文献]

- Billig, Michael. 2008. The languag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ase of nominalization. *Discourse & Society* 19 6:783-800.
- Chouliaraki, Lilie and Norman Fairclough.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orma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 2012.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Hailong Tian (田海龙) and Peng Zhao (赵芃),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Pp.181-225. [2012, 《批评性语篇分析: 经典阅读》。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81-225 页。]
- Fairclough, Norman and Phil Graham. 2010. Marx a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 The genesis of a critical method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 capital. In Norman Fairclough,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Pp.301-46.

- Fairclough, Norman and Ruth Wodak.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eun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Pp.258-84.
- Gal, Susan. 1998. Peasant men can't get wives: Language change and sex roles in a bilingual community. In Jennifer Coates, ed., *Language and Gender: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p.147-59.
- He, Cuixiang (贺翠香). 2012.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Frankfurt school in China. *Marxism & Reality* 1:132-8. [2012,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 132-8页。]
- He, Liye (何丽野). 2005. Textual questions to "return to Marxism".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112-7. [2005, 对“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质疑。《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 112-7页。]
- Holborow, Marnie. 1999.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London: Sage.
- Ji, Yongmei (纪咏梅). 2008. From "supplementing", "amending" to deviating Marxism: The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arxism. *Frontier* 5:29-31. [2008, 从“补充”、“修正”到背离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前沿》第5期, 29-31页。]
- Kress, Gunther. 2001. From Saussure to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The turn towards a social view of language. In Margaret Wetherell, Stephanie Taylor, and Simeon J.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29-38.
- Kristeva, Julia (克里斯蒂娃). 2016. *Subjectivity, Intertext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The Collection of Kristeva's Speeches at Fudan University*,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Trans. by Keyi Zhu and Bei Hu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2016, 祝克懿、黄蓓译,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 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Krzyżanowski, Michał. 2016. Recontextualisation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increasingly conceptual nature of discourse: Challenge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Discourse & Society* 27 3:308-21.
- Krzyżanowski, Michał and Bernhard Forchtner. 2016.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Facing challenges, moving beyond foundations. *Discourse & Society* 27 3:253-61.
- Labov, William. 1997.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 in New York department stores. In Nikolas Coupland and Adam Jaworski, eds.,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Pp.168-78.
- Matejka, Ladislav and Irwin R. Titunik. 1973.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Valentin Volos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Ladislav Matejka and Irwin R. Titunik. New York, NY / London: Seminar Press. Pp.1-6.
- Miao, Xingwei (苗兴伟) and Junfang Mu (穆军芳). 2016.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CDA.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4:532-43. [2016, 批评话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当代语言学》第4期, 532-43页。]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2010. Review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68-70. [2010, 《语言与全球化》介绍。《当代语言学》第1期, 68-70页。]
- . 2013. The attribut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sociolinguistic disciplinary.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1:107-16. [2013, 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107-16页。]
- . 2015. New rhetoric grounded with the rising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ntemporary Rhetoric* 4:32-40. [2015, 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当代修辞学》第4期, 32-40页。]
- . 2016a. Revisiting the tenets of CDA: A discussion of CDA related question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1-9. [2016a,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 1-9页。]
- . 2016b. Linguistic paradigm of discourse studies: Developing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6:3-9. [2016b, 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 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山东外语教学》第6期, 3-9页。]
- Trudgill, Peter. 1974.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Jinfu (王金福). 2012. Re-defending "Returning to Marxism". *Academic Review* 1: 34-41. [2012, 为“回到马克思”再辩护。《学术评论》第1期, 34-41页。]
- . 2013. "Zhang Yibing's Problem": Is it possible to "return"? *Academic Review* 1: 42-9. [2013, “张一兵难题”: “回到”是否可能? 《学术评论》第1期, 42-9页。]
- Wang, Yin (王寅). 2014. *Researches 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语言哲学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Wei, Zhiqiang (卫志强), ed. 2015. *Marx, Engels, Lenin, Stalin on Languag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Wodak, Ruth, Rudolf de Cillia, Martin Reisigl, and Karin Liebhart. 2009.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2nd edition. Trans. by Angelika Hirsch, Richard Mitten, and J. W. Ung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Xiao, Junming (萧俊明). 2001. 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Social Sciences Abroad* 1: 41-6. [2001,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新思考。《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 41-6页。]
- Zhang, Yibing (张一兵). 1999. *Return to Marxism*.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1999, 《回到马克思》。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Zhao, Peng (赵芃). 2016.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legitimization of expert knowledge: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medicine promotion on a TV programme.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6: 24-8. [2016, “专家知识”的话语建构及其合法化——一档电视节目中药品推广的话语策略分析。《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6期, 24-8页。]
- Zhao, Peng and Hailong Tian. 2013. Revisiting recontextualization: A metadiscour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4: 1-6. [2013, 再情景化新解: 元话语视角。《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4期, 1-6页。]

#### 第一作者简介

田海龙, 男, 博士,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兴趣: 话语研究、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代表作: “话语与中国的公共领域——关于吴英案的探讨”和“教学评估报告的话语生产——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电子邮件: tianhl@tjfsu.edu.cn

TIAN Hailong, male,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discourse studies,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al semiotic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Discourse and public sphere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Wu Ying lawsuit case" and "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 report: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mail: tianhl@tjfsu.edu.cn

作者单位及通信地址: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 300204  
赵 芃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市北辰区光荣道 409 号 300134  
E-mail: zhaopeng@tjcu.edu.cn

**Affiliation and Contact:** Prof. Tian Hailong,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117 Machang Road, Hexi District, Tianjin 300204